臺大歷史學報第 73 期
2024 年 6 月，頁 1–42

BIBLID1012-8514(2024)73pp.1–42
2022.7.5 收稿，2023.5.25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406_(73).0001

唐宋時期成都城「市」的空間演進

伍　磊*

提　要

唐宋成都城「市」的空間進化理路清晰。承接隋代以前城外「成都市」的區位，唐代前期在成都子城外出現了亦城亦郊的西市和南市；唐代中晚期（876 年前），郊市構成了成都城東、南、北部郊城擴展的重要內容，包括東市、新南市、寶曆寺蠶市、至真觀蠶市；唐代後期（876 年後）至宋初，成都羅城修建後，街市逐漸取代郊市，開始常見於羅城區域；北宋中期，基於官府鼓勵，街市發展走向穩定、成熟。

唐宋成都城「市」的空間演進路徑連貫，在成都府的主導下，綜合人文和自然等區位因素，市的空間與城區擴展、官民城市生活的需要保持了一致。

關鍵詞：唐宋　成都　市　空間　區位

* 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特聘研究員
610106 中國成都市成洛大道 2025 號；E-mail: wul@pku.edu.c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亦城亦郊：唐前期成都城的官市空間
二、唐中後期（876 年前）成都城的郊市空間
三、唐後期（876 年後）至宋初郊市向街市空間的轉變
四、北宋中期成都城街市的成熟與空間
結 語：城「市」空間的連續性演化脈絡及特徵

前 言

「市」是古代中國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對唐宋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市制的討論。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加藤繁（1880–1946）刊布經典的〈宋代都市的發展〉、〈唐宋時代的市〉等文，認為唐宋時期城「市」管理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市制由封閉向開放進化。[1]對於這種觀點，認可者有之，並認為這種管理制度的演變，在空間上表現為整齊坊市向自由坊市形態突破；[2]質疑者亦有之，主要是對市制「封閉」與「開放」的時間、[3]地域、[4]內容及材料解讀[5]上提出各自的理解。前輩學者討論的對象大多集中於唐宋都城，對占絕對數量的地方城「市」，受限於材料稀少，鮮有專門探討者。[6]制度的運行和存在本就是一個動態的

1 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唐宋時代的市〉，收入氏著，吳傑譯，《中國經濟史考證》卷 1（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 239–277、278–303。

2 施堅雅，〈導言：中華帝國的城市發展〉，收入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24；寧欣、陳濤，〈唐宋城市社會變革研究的緣起與思考〉，《中國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北京），頁 30。

3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459–464。

4 妹尾達彥，〈城市的生活與文化〉，收入谷川道雄主編，李憑等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326–329。

5 成一農，〈「中世紀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2 期（北京），頁 77–80。

6 對唐宋地方城「市」的討論，可見李孝聰，〈唐代城市的形態與地域結構——以坊市制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程。[7]稀少的材料、地方城市的缺位，基於此而爭議市制，呈現的多是其不連續的片段。持變革觀點的唐宋市制研究者，注重「革命」性城「市」敘述，[8]觀察視角集中在「唐宋間歷史的裂變」，而「忽略歷史演變的前後承襲」。[9]對此持批判觀點者，或從唐代市制的長時段承襲，說明其符合當時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要求和城市軍政中心的實質；[10]或從學術史的角度，呼籲唐宋城市的研究需注重變革與連續的統一，[11]故亟需從實證層面對「市」本身所具有的連續性進行論證。總之，唐宋「市」制的研究成果，整體上所揭示的唐宋城「市」進化邏輯和理路連續性較為缺乏。如何解決此問題？包偉民提出了一個探索方向，在「個案研究基礎之上，作實證式的歸納」，從而增進對唐宋城市全局的認識。[12]糾結於制度討論，顯然缺乏材料支撐，而任何「市」都離不開空間場地，空間應是「市」的另一重要內容，或能為連續性討論提供可能性。本文研究時空環境下唐宋成都城「市」的空間演進個案，作為上述探索方向的一種嘗試。

為何選擇唐宋成都城作為個案進行「市」的空間研究？除了唐宋成都城擁有較為活躍的蠶市、藥市貿易之外，[13]主要還有橫向和縱向兩個

的演變為線索〉，收入氏著，《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61–112。

7 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浙江學刊》2003 年第 3 期（杭州），頁 100–101。

8 寧欣、陳濤，〈「中世紀城市革命」論說的提出和意義——基於「唐宋變革論」的考察〉，《史學理論研究》2010 年第 1 期（北京），頁 125–134。

9 包偉民，〈唐代市制再議〉，《中國社會科學》2011 年第 4 期（北京），頁 179–180。

10 包偉民，〈唐代市制再議〉，頁 179–189。

11 陳濤，〈唐宋城市史研究再思考〉，收入楊共樂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1 年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頁 274–276。

12 包偉民，〈唐宋城市研究學術史批判〉，《人文雜誌》2013 年第 1 期（西安），頁 96。

13 許凱翔總結了近代以來關於唐宋成都蠶市和藥市的研究情況。許凱翔，〈八十年來唐宋史議題中關於特定商品集市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 27 期（2013 年 12 月，臺中），頁 107–136。許氏對唐宋成都蠶市和藥市的單篇論述亦較為詳盡。許凱翔，〈唐宋蜀地廟市的宗教空間：以三月三日蠶市為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70 期（2020 年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原因：橫向方面，古代成都城市空間與都城長期具有相似性。自秦代建城之始，其空間就與都城相仿，「儀與若城成都……修整里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14]到晚唐，成都城「阡陌繩直，門閭棋布」；[15]至宋代，成都城「街名棋盤路九逵，江號濯錦如汙池」。[16]棋盤式的城市空間格局無疑使人聯想到隋唐長安城。縱向方面，從秦至宋成都城市空間一脈相承，具有前後繼承性。如宋初重修益州治所時，知益州張詠（946–1015）引當時所見《圖經》曰：「秦惠王遣張儀……卜築是城……由漢至唐，逆順增損……（隋楊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南西二隅……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17]橫向相似性與縱向繼承性交織，構成了唐宋成都城市空間演化的主要路徑。已有學者注意到唐宋成都城市空間在地方城市中的代表性，[18]故從演化路徑而言，唐宋成都城「市」的空間歷程，可以管窺地方城「市」的變遷。

在討論唐宋成都城「市」的空間進化之前，需要說明當時成都城所在地與城市發展相關的空間地理情況。秦漢唐宋時期，成都城主要面對四個環境因素：一是地下水位過淺，可利用土層過薄；[19]二是土質多為

---

1 月，香港），頁 29–59；許凱翔，〈宋代成都玉局觀藥市的宗教性〉，《臺大歷史學報》第 64 期（2019 年 12 月，臺北），頁 85–123。重要的唐宋成都蠶市和藥市研究還有：鞠清遠，〈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食貨》第 3 卷第 6 期（1936 年 2 月，上海、北平），頁 28–34；魏華仙，〈宋代成都官府力量與節日市場〉，《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成都），頁 159–168。

14 常璩著，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卷 3，〈蜀志〉，頁 108。

15 王徽，〈創築羅城記〉，收入袁說友等編，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以下簡稱《文類》）（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24，頁 499。

16 樓鑰，《攻媿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2003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卷 3，〈送王粹中教授入蜀〉，頁 54。

17 張詠，〈益州重修公宇記〉，《文類》，卷 26，頁 520。

18 宿白認為唐代成都城「坊」的空間設置，在地方大型州、府城中具有代表意義。宿白，〈隋唐城址類型初探（提綱）〉，收入北京大學考古系編，《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週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279–285。

19 唐成都城中北部的賓隆街遺址，唐中前期地層厚度為 50–60 公分，其下則為 90–110 公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含沙黃黏土，不利於夯築牆垣、道路；[20]三是面臨郫江水患；[21]四是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唐中前期及以前，成都城穩定的建築區域集中在今日的天府廣場及稍北，即城東北部。[22]唐晚期，南詔三次兵臨成都城，城外區域被兵火焚毀殆盡。[23]唐末，成都城內系統化建立夯築街道和磚鋪水渠。乾符三年（876），節度使高駢（821–887）修築羅城，改造郫江，由此，成都城內人居和貿易環境大為改善。[24]唐宋成都「市」的空間進化，即以上述時空環境為前提進行。

分的純淨層，再其下則為純淨含水層，唐前期可利用地層應在 50 公分之內；唐成都城西南的方池街遺址，戰國早期及之前地層為淤泥、卵石和洪積層，漢晉時期形成的新地層厚度為 60 公分，扣除地下水位，唐代可利用地層仍較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內姜街遺址發掘報告〉，收入氏編著，《成都考古發現（2004）》（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366；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方池街古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 年第 2 期（北京），頁 298。

20 這在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中均有體現。文獻記載如唐僖宗時期王徽（?–891）〈創築羅城記〉曰：「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磽埆，版築靡就。前人之不為，非不為也，蓋不能也」；考古發掘如成都唐代羅城門遺址，其牆基所用夯土——異地取來的紫色黏土，比當地黃黏土更適合用於夯築。王徽，〈創築羅城記〉，《文類》，卷 24，頁 497；蔣成，〈論成都唐宋羅城 1、2 號門址〉，收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成都考古研究（2009）》（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 536。

21 天府廣場是漢代成都城核心位置，且有漢代沖積地層，出土漢碑亦載「遭水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廣場東御街漢代石碑發掘簡報〉，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8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5、7。

2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認為，今天府廣場及周邊區域「屬於秦漢以來成都大城的範圍，是歷代王府、宮苑、官署及其他高等級建築的集中分佈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古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4。

23 如唐末杜光庭（850–933）稱，南詔圍成都「是時，城外屋宇且焚且毀」。杜光庭，《道教靈驗記》，收入氏撰，羅爭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1，〈成都青羊殿驗〉，頁 163。

24 詳見易立對成都江南館街遺址、內姜街遺址、鼓樓北街遺址、正科甲巷遺址之道路和水渠的研究。易立，〈唐宋時期成都城里坊格局與形態的考古學觀察〉，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22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頁 268–27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亦城亦郊：唐前期成都城的官市空間

成都城的「市」傳承十分悠久。秦代即在成都城設置官市。[25]漢代成都之市被稱為「成都市」，[26]「成都市」設有官長管理，當為官市，[27]至南朝仍存。[28]隋代之前「成都城」與「成都市」的關係，大致是「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都門」與「閭」指秦代所修成都城主體大城、少城區（簡稱秦城）；[29]「兩江珥其市」指「成都市」的主體區域，位於秦城外西、南的郫、檢兩江之間及附近。[30]「成都市」的地理位置應基於以下兩個區位因素：一是便於利用郫江的水運功能；二是排水情況稍優的城內，作為對水環境更為挑剔的官署和

25 羅開玉，〈秦在巴蜀的經濟管理制度試析——說青川秦牘、「成亭」漆器印文和蜀戈銘文〉，《四川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 年第 4 期（成都），頁 82。

26 「成都市」一詞出自《漢書》「君平卜筮於成都市」。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點校本），卷 72，〈王貢兩龔鮑傳〉，頁 3056。

27 《華陽國志》載「成都市官本有長」；馬王堆漢墓亦出土了帶有「成市草」、「成市飽」等烙印戳記的漆器。常璩，《華陽國志新校注》，卷 3，〈蜀志〉，頁 137；俞偉超、李家浩，〈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漆器製地諸問題——從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歷史變化〉，《考古》1975 年第 6 期（北京），頁 346。

28 南朝宋時，「成都市」仍存，「泰始中（465–471），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境。』」。雖可理解為「成都市」「橋」和「成都」「市橋」兩種意思，但均指兩江之間的區域（見註 30、註 36），從地域上可視為「成都市」。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點校本），卷 15，〈州郡志〉，頁 298。

29 秦代所修成都城的形態，參見羅開玉、謝輝，《成都通史．秦漢三國（蜀漢）時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頁 76。

30 《成都通史》也認為「成都市」位於兩江之間，呈不規則長條形，東西長約 1.5–2 公里，南北寬約 0.6–0.9 公里。需要說明的是，據俞偉超、李家浩研究，漢代成都應有「成市」、「南鄉」、「北市」等多處官市，具體位置則不可考，「成都市」或專指某市，或是諸市的統稱，難以考究。為方便討論計，本文的「成都市」，專指位於郫、檢兩江之間及其附近的市，應能涵蓋漢代諸市的主體範圍。揚雄，〈蜀都賦〉，《文類》，卷 1，頁 2；羅開玉、謝輝，《成都通史．秦漢三國（蜀漢）時期》，頁 97。俞偉超、李家浩，〈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漆器製地諸問題〉，頁 34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居住區。然而，「成都市」並非全部用作市場區域，而是與祠廟、[31]軍營、[32]學校、[33]住宅[34]相雜處，或許還存在手工業作坊。[35]核心區域主要有兩處，均位於橋樑和城門交會的交通要道：一是秦少城西門外的郫江市橋一帶，[36]二是秦大城南門外的郫江江橋一帶，[37]尤以前者為重。「成都

31 《太平寰宇記》載，李冰祠位於成都「府西南三里」的郫江邊，「及唐，節度使李德裕重立祠宇」，其修建年代應早於唐，位置應在「成都市」內。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72，〈益州〉，頁 1469。

32 劉琳《華陽國志新校注》點校為：「蜀郡，州治……郡更於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有女墻。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其郡四出大道，道實二十里。」按照劉琳點校之意，則是車官城周圍為軍營。此段後半部分應點校為「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理由一、《華陽國志》此為專敘蜀郡和益州州治所在地成都城及附近的景物，「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與「其郡四出大道」相對應，當為總敘成都城周圍的簡況；如城東郊有漢代所建古城，「玄壇廟，華陽治東五里，唐光化三年（900）建……後有漢古城」，城北郊有成漢李特所建赤塗城，「赤塗城，李特所築，在府治北三里許」。理由二、夷里橋為檢江之橋，車官城位於夷里橋南岸西側，與錦官城隔道相對，兩城北鄰檢江。車官城周圍地域並不寬廣，如何安置軍城？因此，此處「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當指成都城周圍包括西、南部「成都市」區域的情況。常璩，《華陽國志新校注》，卷 3，〈蜀志〉，頁 128–129；馮任等纂，天啟《新修成都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 1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 據 1962 年熊承顯抄本影印），卷 3，〈建置志〉，頁 66、76。

33 《漢書》載西漢蜀守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班固，《漢書》，卷 89，〈文翁傳〉，頁 3626。

34 成都秦城西南市橋門外郫江邊有「晉王羽宅，後捨為寺，改名龍淵」；漢司馬相如宅亦在附近；漢官府在文翁所修學官附近營建了大量住宅，如建武十年（34），益州太守文參「增造吏舍二百餘間」。曹學佺撰，劉知漸點校，《蜀中名勝記》（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卷 1，〈川西道〉，頁 6、8；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成都城坊古蹟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頁 329。

35 紹風、石湍稱在今西勝街西口至方池街一線的西南，曾「發現大面積的爐渣堆積層，內含有不少『直百五銖』鐵錢，據考證，這里可能是三國蜀漢時期的冶煉廠遺址」。「成都市」中，或存在手工業作坊。紹風、石湍，〈「金河」為「郫江」故道說（上）〉，《成都文物》1983 年第 1 期（成都），頁 40。

36 《太平寰宇記》引東漢李膺《益州記》稱「漢舊州市在（市）橋南」。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72，〈益州〉，頁 146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市」地勢低下，常受洪水侵襲，主要區域或為蘆葦蕩，[38]其範圍內的考古發掘探明了戰國時期修建、分布並不規律的水壩與河流故道。[39]如為減輕郫江水患，秦代李冰開鑿了「石犀渠」，縱穿「成都市」而過，[40]將「成都市」區域切割成支離破碎狀。秦漢時期，「成都市」區域常受洪水影響，並沒有規律和整齊的道路、牆垣、夯製地基等建築設施，而多是洪積層；直至唐代，建築基址才趨於穩定。[41]有學者認為，「成都市」以郫、檢二江為牆，「橋為門、喉」。[42]總之，「成都市」的空間獨立於秦城而存在，散漫的形態與由「閭」構成的秦城存在較大差距。

隋代，坊市制在都城推行，地方城市亦開始模仿此政策。隋蜀王楊秀（573–618）出鎮成都，改造成都秦城東部的大城為子城（簡稱楊秀子城）。楊秀子城的核心地域在今天府廣場北側一帶。[43]此次改作應未涉

37 西晉惠帝之時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常璩，《華陽國志新校注》，卷 8，〈大同志〉，頁 368。

38 羅開玉、謝輝，《成都通史・秦漢三國（蜀漢）時期》，頁 97。

39 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方池街古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 年第 2 期，頁 297–298；四川大學博物館、成都市博物館，〈成都指揮街周代遺址發掘報告〉，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1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頁 173–174；成都市文物考古隊、四川大學歷史系，〈成都市上汪家拐街遺址發掘報告〉，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5 輯（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頁 326–327。

40 羅開玉、謝輝，《成都通史・秦漢三國（蜀漢）時期》，頁 76。

41 這點從指揮街遺址地層可以看出，其周代地層被洪水破壞，秦漢地層缺失，唐宋地層趨於穩定。在指揮街遺址西北側約 850 公尺、同位於「成都市」的上汪家拐街遺址中，漢三國地層是洪水沖積形成的含沙黏土。四川大學博物館、成都市博物館，〈成都指揮街周代遺址發掘報告〉，頁 174；成都市文物考古隊、四川大學歷史系，〈成都市上汪家拐街遺址發掘報告〉，頁 326。

42 羅開玉、謝輝，《成都通史・秦漢三國（蜀漢）時期》，頁 97。

43 隋代辛慧源簡敘楊秀改造成都城的方式為「為其都鄙而經之，闢其閭里而居之」，宋初知益州張詠引用《圖經》詳載「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南西二隅，通廣十里」，楊秀子城即是隋唐州城，「摩訶池在州中城內」。成都市體育中心古遺址發現了摩訶池岸線，此地既是秦大城核心區，又是隋唐時期的州城。楊秀「附張儀舊城」指改建秦大城為子城，並向大城西南方向拓寬，此次改造當有模仿長安城規整城市形態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秦城西、南部原少城的牆垣。西川節度使高駢在乾符三年（876）上表稱「寇來而士庶投竄，只有子城」，即南詔攻打成都時，只有子城作為防禦；[44]又《舊唐書．高駢傳》稱「蜀土散惡，[45]成都比無垣墉」。[46]實際上，楊秀子城的西、南部遺留了秦代初築的少城牆垣，但其年久失修，又遭戰爭破壞。南朝任豫《益州記》稱「諸樓年代既久，榱棟非昔，惟西門一樓，獨有補葺，張儀時舊跡猶存」；[47]東晉桓溫（312–373）在永和三年（346）討伐成漢佔領成都後，「夷少城，獨存孔明廟」。[48]可以推測，楊秀改築大城為子城後，鑒於「蜀土散惡」，並沒有維護和增修少城，少城牆垣處於「比無垣墉」的狀態，所以才有「只有子城」之語。楊秀子城之外的秦城區域，雖然亦被稱為「西郛」，但實際是介於城、郊之間的模糊地帶。[49]唐代前期所存官市，就位於這些模糊地帶中。

的因素。成都市體育中心古遺址的隋代摩訶池岸線及建築群形態規整，在其西約 420 公尺的西御河地塊遺址，發現了隋代所建的規整城市軸線道路。摩訶池岸線及建築群和軸線道路均為南偏西約 30 度方位，呈平行狀，顯示出整齊的城市規劃。辛惠源，〈至真觀記〉，《文類》，卷 36，頁 691；張詠，〈益州重修公宇記〉，《文類》，卷 26，頁 520；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31，〈劍南道〉，頁 76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東華門古遺址 2013–2014 年度發掘收穫〉，《成都文物》2015 年第 1 期（成都），頁 9；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 2020 年田野考古工作紀要〉，《成都文物》2021 年第 1 期（成都），頁 76。

44 高駢，〈請築羅城表．又表〉，《文類》，卷 18，頁 381。

45 此句指成都城址的土質情況。成都城址由第四系全新統沖積層粉質粘土、粉土、細砂、中砂和卵石土構成。上層可塑性較強的粉質粘土厚度僅為 0–1.7 公尺，下層為粗粒徑、透水性強、空隙大的鬆散砂土和卵石土，後者塑性較差，無法用作建築修造。成璐，〈成都地鐵 1、2 號線工程主要水文地質問題分析〉（成都：成都理工大學環境地質專業碩士論文，2008），頁 17–18。

46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卷 182，〈高駢傳〉，頁 4703。

47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72，〈劍南西道〉，頁 1466–1467。

48 祝穆撰，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51，〈成都府路〉，頁 914。

49 大和三年（829），南詔「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南詔進入秦少城，繼續圍攻東邊的楊秀子城。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卷 222，〈南詔傳〉，頁 628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原「成都市」市橋核心區域被作為「竹園」賜給楊秀。[50]唐前期，著名詩人岑參（715–770）看見漢晉「成都市」市橋區域荒廢已久，「君平曾賣卜，卜肆荒已久」。[51]隨後，該區域官設西市的記載開始出現。《酉陽雜俎》載，開成年間（836–840），「成都乞兒嚴七師……居西市悲田坊」。[52]唐前期，朝廷設置了以寺廟僧尼主領、救濟貧病者的悲田坊；[53]又，隋唐時期成都城西佛寺眾多，是「重要宗教文化區域」。[54]在寺廟集中分布的西市區域中設置悲田坊，與唐前期制度相符。西市中還居住了西川節度使幕僚，如《北夢瑣言》載「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輩最號廉直……家在成都西市」。孔目官為唐中晚期藩鎮幕府官，「西川」應指劍南西川，此條內容的時間應在唐晚期。[55]五代前蜀改楊秀子城為皇城，[56]此時仍有西市的記載。[57]西市當位於皇城、楊秀子城之外，即成

50 楊秀「竹園」包括市橋附近李冰置石犀的區域。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卷 1，〈川西道〉，頁 8。

51 岑參撰，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嚴君平卜肆〉，頁 233。

52 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續集卷 3，〈支諾皋〉，頁 1599。

53 唐初，唐廷設置悲田坊，以使者專知悲田坊事。開元五年（717），宋璟（663–737）奏：「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元宗不許。至二十二年（734），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給之。」到了會昌五年（845），李德裕（787–849）又奏：「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改為養病坊。」唐前期悲田坊當由官府督辦，其事務主要依靠佛教僧尼執行。成都府西市為悲田坊，東市為養病院（見註 68），悲田坊設置符合唐前期制度。王溥撰，《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49，〈病坊〉，頁 863。

54 華西都市網，〈成都寬窄巷子旁挖出千年名剎「福感寺」〉，原載《華西都市報》，2017 年 6 月 5 日，http://news.huaxi100.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8&id=891183.

55 孫光憲撰，賈二強校點，《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7，〈李學士賦讖劉昌美勾偉附〉，頁 153。

56 公元 907 年，前蜀建國，以「府城為皇城……成都府移在子城外」，子城、府城所指地域相同，為楊秀所修子城。張唐英撰，冉旭點校，《蜀檮杌》卷上，收入傅璇琮等主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10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6073。

57 何光遠撰，鄧星亮等校注，《鑒誡錄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1），卷 3，〈妖惑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西部原秦少城區域。西市的具體位置還可通過南宋陸游（1125–1210）的敘述進一步確認。陸游在成都時，居住於西市之中，「青城訪隱翁，西市買幽圃」。陸游曾敘述其居所的地理環境，「石笋街西風景幽，醉眠万事付悠悠。倦游我已七年客，促駕春無三日留。枝上蝶稀紅藥老，舍中蠶起綠桑柔」。[58]唐宋石笋街鄰近西市，位於今成都市實業街附近。[59]西市當位於市橋之北側，此地是成都城內地理條件較優處，其地勢稍高，可以盡量規避郫江水患的影響，又能享受舟楫之利。從空間位置推測，「成都市」荒廢前後，官府應在成都少城靠近市橋的區域修建了西市，用以接續城市貿易空間。

原「成都市」江橋核心區域被唐南市所接續。開元末、天寶初年，節度使章仇兼瓊（?–750）在江橋東北側，亦即外郭城南門內的東南側，修建了棋盤市：「成都唐棋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60]「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者」。[61]棋盤市即是唐宋時期成都的南市，「南市，一名棋盤市」。[62]南市區位與西市相似，位於亦城亦郊、鄰近郫江的地域。

眾〉，頁 83。

58 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劍南詩稿校注》第 9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卷 61，〈雜感五首以不愛入州府為韻．又〉，頁 361；第 2 冊，卷 7，〈三月十六日作〉，頁 151。

59 央廣網，〈三藏法師在此受戒　神秘古剎福感寺就在成都實業街〉，原載《華西都市報》，2017 年 6 月 29 日，http://sc.cnr.cn/sc/2014jiaodiantu/20170629/t20170629_523824393_2.shtml.

60 薛季宣，〈敘握奇經〉，收入曾棗莊編，《宋代序跋全編》（濟南：齊魯書社，2015），卷 37，頁 1004。

61 《方輿勝覽》引《成都圖經》、《興元志》云：「武侯之八陣凡三，在夔者……在綦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十營法也……興元西縣……八陣凡四矣。」《萇楚齋四筆》稱：「《圖經考》八陣圖有四。在彌牟鎮者……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者，亦云貳百伍拾有陸。」《萇楚齋四筆》與《方輿勝覽》同樣應是採納了《成都圖經》的內容。《成都圖經》的修撰時間應不晚於宋代。《圖經考》稱「益州」，嘉祐四年（1059）宋廷改益州為成都府後，益州名號未再正式使用。《成都圖經》所修「棋盤市」條的內容或至遲形成於北宋中期。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齋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4，〈蜀漢諸葛亮八陣圖〉引《圖經考》，頁 759；祝穆，《方輿勝覽》，卷 57，〈夔州路〉，頁 1016。

62 王應麟撰，傅林祥點校，《通鑑地理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11，〈蜀漢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唐成都城南市與長安城東、西市相仿，街巷縱橫，呈棋盤狀規整形態。南市格局一直保存至宋代。據宋人描述，時人「履其市，道繩直，閭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為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于盡日，迷不能去」。[63]巷陌縱橫的「南市」整齊似軍隊營房，被宋人附會為諸葛亮（181–234）駐兵處，南宋王應麟（1223–1296）引《成都圖經》，稱棋盤市為「八陣圖」，「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64]由此，可推測南市街巷或為 16×16 的縱橫式布局。杜甫（712–770）寓居成都時，有詩「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65]可見南市或以竹籬標定建築區域。[66]

總之，唐前期成都城官市的空間演化歷程，一方面繼承秦漢「成都市」的區位，另一方面官市擴張基於自然環境而調適。唐前期形成的西市位於城西，接近漢晉「成都市」市橋區域；稍後形成的南市位於城東南，與漢晉「成都市」江橋區域相鄰。隋楊秀只整修了子城，位於子城之外的西市和南市實際處於「城」與「郊」間的模糊地帶。即便如此，較之於城外散漫的漢晉「成都市」，唐成都西、南市的空間格局和位置與「城」更為接近。

重鎮〉，頁 314。

63 薛季宣，〈敘握奇經〉，收入曾棗莊編，《宋代序跋全編》，卷 37，頁 1004。

64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 11，〈蜀漢重鎮〉，頁 314。

65 杜甫，〈春水生二絕・又〉，《文類》，卷 3，頁 50。

66 唐代成都南市鄰近郫江，在其附近的指揮街遺址，春秋地層出土了竹編填沙框及成排木樁，唐代地層出土了「大量」的竹製「編織物」。《資治通鑑》亦載咸通十一年（870）南詔圍攻成都子城時「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為蓬」。由此推測，杜甫所謂南市之「籬」，或為標定地界，兼具防洪之圍。四川大學博物館、成都市博物館，〈成都指揮街周代遺址發掘報告〉，頁 171–209；成都市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成都指揮街唐宋遺址發掘報告〉，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2 輯（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 287；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252，「唐僖宗咸通十一年二月癸未」條，頁 815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唐中後期（876 年前）成都城的郊市空間

隋蜀王楊秀修建了成都子城，外城主要沿用秦少城，面積狹小、擁擠。唐代前期，成都官市尚在外城之內。唐代中後期，成都城區向牆垣之外擴展，形成了郊區之市。

（一）東郊之市

成都東市的最早記載源於《酉陽雜俎》:「韋南康鎮蜀，時（785–805）有左營伍伯……家在府東市。」[67]可見東市之部分應作軍營之用。《茅亭客話》載「偽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淘沙子」，成都城專淘溝渠的「淘沙子」群體寓居東市中。此處所記為五代後蜀之事，但東市及養病院的設置應承襲唐代而來。時人文谷遇見「淘沙子」們在東市附近歇息、活動，「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68]聖興寺位於成都城外偏東，應距東市較近或在其之中。五代時，東市位於皇城——即楊秀子城之外；唐中後期，東市當位於成都城的東郊，五代東市中還有國清寺、民宅，可見其規模甚大。[69]因唐中前期成都城仍大致承襲秦大、少二城東西並列的格局，同時楊秀子城是成都府、西川節度、摩訶池所在，應無法安置軍營、官市、養病院一體的東市區域，故東市位於成都城東郊較為合理。

東市的修建，應與唐玄宗（685–762，712–756 在位）幸蜀及其後成都城東郊的城區化有關。唐初，成都城東郊尚有秦漢舊景，[70]劉希夷

67 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 7，〈金剛經鳩異〉，頁 1979。

68 李大臨，〈聖興寺護淨門屋記〉，《文類》，卷 38，頁 739。

69 黃休復撰，趙維國整理，《茅亭客話》，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1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卷 3，〈淘沙子〉，頁 22。

70 《東觀漢記》載公孫述（?–36）稱帝時期，「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帝倉」。倉城位於大城東面，《太平御覽》引《益州記》曰「今成都縣東有頹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此處《益州記》為東漢李膺（110–169）或南朝任豫所修，當時益州附郭只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651–679）〈蜀城懷古〉有「鳥雀參秦倉」之句。[71]玄宗幸蜀一行規模龐大，到達成都時，「扈從官吏軍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72]後官吏陸續趕赴成都，「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73]玄宗並未居於成都城中，而是以子城外東郊的「使院」為行宮。[74]扈從官吏軍將的活動空間，也應圍繞玄宗行宮而展開。因此唐玄宗幸蜀後，成都東郊一帶建築區發展迅速。如玄宗敕建的大慈寺規模宏大，「勅新羅全禪師為立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75]又如玄宗幸蜀前後，西川軍將、御史大夫王承俊在城東郊修建了居所，「成都府城之東偏……御史大夫王承俊之宅也」；[76]再如綿州司馬、神策軍將魏師魯（806–878）「築室錦官城東」，較具規模，環境優美。[77]成都城東郊設立官市，不僅可以服務周圍居民，亦符合「車駕行幸處，即於頓側立市」的規制。[78]

（二）南郊之市

公元 9 世紀初，成都西、南、東三市形成。隨著唐代中期成都城經濟社會的發展，新的城區出現。一是成都城東、西郊已趨於擁擠，城區

有成都一縣，縣東郭外當指益州城之東。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21，〈載記・公孫述〉，頁 912；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第 2 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卷 190，〈居處部・倉〉，頁 787。

71 劉希夷，〈蜀城懷古〉，收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據揚州詩局本斷句排印），卷 82，頁 883。

72 劉昫等，《舊唐書》，卷 9，〈玄宗紀〉，頁 234。

73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點校本），卷 228，〈王積薪〉，頁 1749。

74 流沙河，〈唐玄宗成都行宮推測〉，《文史雜誌》2011 年第 4 期（成都），頁 4。

75 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41，〈法運通塞志〉，頁 955。

76 李大臨，〈聖興寺護淨門屋記〉，《文類》，卷 38，頁 739。

77 崔瑗，〈魏師魯墓誌銘〉（成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78 王溥，《唐會要》，卷 86，〈市〉，頁 158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需向新地域拓展。[79]城南郊郫、檢兩江地帶水運便利，是日常出入成都城的水路碼頭，原本就聚集了酒肆等商業設施，具有開拓新區的基礎；[80]二是城南郊新的城市遊宴活動興盛。唐玄宗天寶末，郫、檢兩江上出現了官府組織的上巳遊江宴會活動，「天寶末，崔圓在益州。[81]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游于江，都人縱觀如堵」。[82]大曆時，又形成四月十九日於城南連續遊江三日的習俗。大曆三年（768），瀘州刺史楊子琳率兵突入成都城，節度使崔寧（723–783）妾任氏，「募兵得數千人」，擊退楊子琳。[83]敦煌殘卷唐代〈冀國夫人歌詞〉載，任氏隨後被唐廷封為冀國夫人「夫人封賞國初開」，〈歌詞〉接敘道：「柳闇南橋花（僕）〔撲〕人，紅亭獨佔二江春……錦帽紅纓紫薄寒，織成團襜鈿裝鞍。翩翩出向城南獵，幾許都人夾道看。」[84]冀國夫人著戎裝，於春季出城南二江而獵，引得城內居民紛紛夾道而觀。隨後演變為遊江習俗，「大曆中，節度使崔寧妻任氏亦居之。後捨為寺，人為立廟於其中。每歲四月十九，凡三日，眾遨樂於此」。[85]故南郊之市的形成當與遊宴

79 唐長慶二年（822），段文昌（773–835）描繪成都城西南菩提寺環境時稱：「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甍之內，獨有岡阜，迴抱數里。」可推測成都城區已經較為擁擠。段文昌，〈菩提寺置立記〉，《文類》，卷 36，頁 698。

80 中唐張籍（767–830）有詩「萬里橋邊多酒家，游人愛向誰家宿」。張籍撰，徐禮節等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6，〈成都曲〉，頁 788。

81 崔圓，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到至德二載（755–757）為劍南節度。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963。

82 陳元靚撰，許逸民點校，《歲時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卷 19，〈避車駕〉，頁 374。

8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24，「唐代宗大曆三年七月」條，頁 7201。

84 佚名，〈冀國夫人歌詞〉，收入岑參，《岑嘉州詩箋注》，附錄 2，頁 842。

85 此處追溯浣花遊江來歷之句，出自北宋葛琳〈和浣花亭〉引《蜀記》。北宋知成都府田況（1005–1063）在重建浣花亭時，作〈浣花亭記〉，稱：「浣花舊有亭，在今梵安佛寺中，唐盧求記成都事，言之頗詳。」葛琳〈和浣花亭〉與田況〈浣花亭記〉文章主旨、內容一致，當為同記一事且同時所作。葛琳在詩前自注曰：「伏覩運使學士留紀浣花亭詩，謹齋沐繼和，拜呈。」葛琳之詩與田況之文，當是應和之作。此處《蜀記》應是唐盧求所撰《成都記》。葛琳，〈和浣花亭〉，《文類》，卷 7，頁 124；田況，〈浣花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活動的興盛有關。

貞元二十年（804），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745–805）「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86]新南市位於成都城南門外約 2 里的郫、檢兩江南岸，[87]建立的大致過程，據韋皋〈寶曆寺記〉稱，「蜀之土薄水淺，居常墊隘，將利其俗，爰圖爾居。乃架雙橋，通習險，規地勢，分直繩。人遷如歸，一日成市」。「土薄水淺，居常墊隘」指成都城址地下水位較淺，[88]可以利用的修造土壤較薄，需要搬運異地土壤來鋪墊建築基址；「架雙橋」指成都主城區到南郊市區需跨越郫、檢兩江，韋皋修建了兩江之上的橋樑。新南市形態「通街」，基礎設施較為規整，促進了新城區的成型，「人逾萬戶，鄽閈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89]除官市外，韋皋還在新南市區域中的寶曆寺設置了蠶市，[90]並撰文記之：「〈蠶市記〉，韋南康文，在華陽縣寶曆寺。」[91]從橋樑等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推知，新南市、寶曆寺及蠶市、居住區為韋皋同時主持修建。[92]原本「黍稷斯茂」的「近郊」，經過韋皋建設，進化為居

亭記〉，《文類》，卷 43，頁 837。

86 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15，〈韋皋令公黃籙醮驗〉，頁 305。

87 萬里橋在成都城南 2 里檢江之上，則新南市區域亦位於城南 2 里。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72，〈益州〉，頁 1465。

88 成都城址位於第四系鬆散砂礫卵石層空隙潛水的強富水區，「滲透性強，給水度大，地下水動態特徵明顯，單孔湧水量 2000 m³/d」。以位於楊秀子城東約 800 公尺的今紅星路下穿隧道為例，現今發現「上層滯水初見水位埋深約 0.7 m，混合水位埋深約 0.9 m。孔隙水初見水位埋深約 3.0 m，穩定水位埋深約 3.2 m」。成璐，《成都地鐵 1、2 號線工程主要水文地質問題分析》，頁 27。唐坤全，〈從紅星路下穿隧道施工淺談成都地區地下工程施工技術〉，《工程科技》2004 年第 2 期（成都），頁 48。

89 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15，〈韋皋令公黃籙醮驗〉，頁 305。

90 韋皋在〈寶曆寺記〉中稱，新南市旁側「崇崇寶剎，雄居厥右」，即是寶曆寺所在。韋皋，〈寶曆寺記〉，《文類》，卷 36，頁 697。

91 王象之撰，趙一生點校，《輿地紀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補闕卷 6，〈成都府路〉，頁 61。

92 韋皋鎮成都時，有營妓薛濤，王建（767–830）贈薛濤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唐中晚期營妓為軍鎮軍伶，由樂營管理。薛濤居於萬里橋邊，或是韋皋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住、官市、蠶市、寺廟合一的成熟郊城。[93]

（三）北郊蠶市

成都城北郊蠶市位於城北至真觀，集期為每年上巳節，即三月初三，由唐中期服務成都城官民遊宴、宗教、交通的郊城區位功能所促進。至真觀敕修於隋開皇二年（582），[94]位於成都城北約 15 里的學射山，[95]與萬歲池相鄰。[96]作為敕建道觀，至真觀基礎設施較好，周圍街道環繞，街區體系完整，「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可為貿易開展提供穩定空間。[97]

至真觀蠶市因成都城官民的上巳遊宴和宗教祈福活動發萌。唐代官方假日和遊宴活動中，尤重上巳、重陽兩期，《唐會要》載「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宴樂」。[98]蜀地具有上巳遊宴的傳統，如隋代益州「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99]唐中期成都城官民重要的遊宴目的地就是兼具（萬歲）池、（學射）山景觀的至真觀一帶。萬歲池位於成都城

安置樂營處。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 6，〈薛濤〉（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106；劉寧，〈唐宋軍伶考述〉（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頁 20。

93 韋皋，〈寶曆寺記〉，《文類》，卷 36，頁 697。

94 辛惠源，〈至真觀記〉，《文類》，卷 36，頁 691。

95 《太平寰宇記》載「學射山，一名斛石山，在（華陽）縣北十五里」，華陽縣為唐宋成都府附郭縣；《茅亭客話》又載「學射山舊名石斛山，昔張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昇，今山上有至真觀」。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72，〈益州〉，頁 1466；黃休復，《茅亭客話》，卷 5，〈鮮于耆宿〉，頁 39。

96 《道教靈驗記》載廣明庚子年（880），范希越「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爲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戊時投印池中」。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13，〈范希越天蓬印驗〉，頁 287。

97 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2，〈益州龍興觀取土驗〉，頁 172。

98 王溥，《唐會要》，卷 29，〈節日〉，頁 545。

99 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 27，〈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閣梨傳〉，頁 104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北，又被稱為北池。杜甫在蜀，作〈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詩，有「閣」、「華館」、「小徑」之語，可見此處具有一定的遊覽設施。[100]岑參〈晦日陪侍御泛北池〉有「都人夾道看」之句，當是城中居民觀摩官員遊宴北池。[101]韋皋擔任西川節度使時，官府整合傳承蜀地舊有習俗，「歲時風俗豪侈，凡所好尚，奇偉譎怪」，主導至真觀一帶上巳之期的遊宴活動，「先是故太師韋公，因是令節」。上巳遊宴之前，由使府整理北池區域的遊覽設施，「先期旬日也，嚴經術，洗涯岸，洞篁篠，熾臺榭」，至期，西川使府組織百戲、水嬉等節日活動，「百戲作，覽水府，摧江蘺，叱天吳……兩為朋曹，獻奇較藝，鉤索勝負」，場景壯觀，引得民眾圍觀，「於是劃萬人之浩擾……觀者山立」。[102]

官府整備遊宴設施和組織節日活動，對民眾上巳日至萬歲池一帶遊賞，應具重要吸引作用。城市居民三月三日到萬歲池附近，還能參與至真觀的宗教活動，如唐初盧照鄰稱「每至三辰法會，八景真遊，霓裳蕩耀魄之華，羽蓋轉風雲之路」；[103]又如唐初至真觀道士元覽「好為人相蠶種，逆知豐損，別宅地之利害，見墓田之氣色，識鬼神之情狀」。[104]三月三日的遊宴和宗教活動應是至真觀蠶市形成的重要背景，唐末前蜀杜光庭稱「三月三日（于）滿川於學射山至真觀看蠶市」；[105]「成都賈瓊，

100 郭知達編，陳廣忠點校，《九家集注杜詩》（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20），卷 26，〈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頁 1163–1164。

101 岑參，〈晦日陪侍御泛北池〉，收入《全唐詩》，卷 200，頁 2084。

102 符載，〈上巳日陪劉尚書宴集北池序〉，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據嘉慶本影印），卷 690，頁 7067。

103 盧照鄰著，李雲逸校注，《盧照鄰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7，〈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頁 439。

104 王太霄，〈元珠錄序〉，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923，頁 9624。

105 杜光庭《神仙感遇傳．于滿川》稱「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另外，《酉陽雜俎》載李固言（782–860）任西川節度使時（837–841），使府有「帖衙俳兒干滿川」。「樂官」與「俳兒」指同一人群，北宋任廣《書敘指南》「樂官曰伶人，又曰俳兒優子」；「于滿川」與「干滿川」均效力於西川使府樂營，極有可能為同一人。由此推之，至真觀蠶市或在李固言任西川節度使時即已存在。杜光庭，《神仙感遇傳》，收入氏撰，羅爭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卷 1，〈于滿川〉，頁 432；段成式，《酉陽雜

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眾齋受籙」。[106]至遲到唐末，成都民眾三月三日到至真觀區域的主要活動包括觀摩遊宴、宗教祈福、遊覽蠶市。

至真觀一帶極具交通區位優勢，「地當樞要，任切會昌，南隣覆錦之城」，既是出成都城北往長安的第一站，「武騎遷升之路，冠蓋雲飛」；[107]也是南來進入成都城的前哨和接待站，「其前臨逸陌……東鄰錦市，竹龍飛轡」，[108]「錦肆前通」，[109]南來北往的人員必經此地。唐代成都城北面的大道經過升仙橋（今駟馬橋前身），再延伸至學射山東南側，[110]此大道又被稱為「京蜀之孔道」。[111]至真觀的具體位置，應在學射山東南側的大道旁。[112]值得注意的是，學射山東南側亦是唐代蠶此鎮所在地，

俎校箋》，續集卷 3，〈支諾皐〉，頁 1599。任廣，《書敘指南》，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2980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墨海金壺叢書本排印），卷 9，〈樂工倡妓〉，頁 103。

106 龍興觀即至真觀。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11，〈賈瓊受正一籙驗〉，頁 261。

107 盧照鄰，《盧照鄰集校注》，卷 7，〈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頁 411、423。

108 辛惠源，〈至真觀記〉，《文類》，卷 36，頁 691–692。

109 盧照鄰，《盧照鄰集校注》，卷 7，〈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頁 442。

110 唐代成都城北向大道從升仙橋通過，升仙橋位於學射山東南約 4 公里，大道繼續往北從學射山東約 1.5 公里處通過。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 4 卷，〈山劍滇黔區〉，頁 902–903；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成都城坊古蹟考》，頁 169。

111 蹇汝明，〈鈍庵記〉，《文類》，卷 44，頁 856。

112 隋代辛惠源〈至真觀記〉稱至真觀「前臨逸陌」，唐盧照鄰〈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亦稱至真觀「南隣覆錦之城」、「使星連珠」，兩者對勘，至真觀位於成都城北不遠處、升仙橋北向大道旁無疑。〈黎君碑〉載唐初黎觀主「又於學射靈山別立仙居一所」，「仙居」謂何，盧氏有語，「即至真之珠庭也」，其內容是「栽松蒔柏，與月樹而交輪；刻桷雕甍，共星樓而接翼。蒼郊卻倚，猶太行之北登；錦肆前通，似灞陵之南望」，「仙居」佔據學射山之形勝，有若長安之灞陵南望，而為至真觀的重要補充。〈黎君碑〉後總詞又有「池起樓臺」之語，「池」或指成都北面之萬歲池。因此，至真觀在隋代修建之時，應位於萬歲池旁當道處，即學射山的東南側。唐初黎觀主在復建至真觀時，在其後不遠處的學射山修建了建築，以佔據江山形勝。盧照鄰，《盧照鄰集校注》，卷 7，〈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頁 416、423、442、45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蠶此鎮的形成與道路的交通區位也應具有一定關係。[113]可以推知，在唐中期之時，成都城北郊的蠶此鎮、萬歲池、至真觀構成了服務城市民眾遊宴、宗教祈福和交通的郊城。杜光庭關於至真觀蠶市的記載，文本形成時間雖然在唐末，但從時空層面觀察，至真觀蠶市是成都城上巳遊宴和至真觀區位優勢相結合長期進化的產物，應萌芽於上巳遊宴開始興盛的唐中期。

由於缺乏城牆保護，戰爭對成都城的郊市空間具有重大影響。唐晚期，南詔數次進抵成都，子城外區域的建築遭到巨大破壞。太和四年（830），南詔「鬬於城下，或縱火以駭眾」。[114]乾符元年（874），劍南西川節度使牛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115]位於城外的新南市、東市應在唐與南詔的數次戰爭中被破壞。如新南市區域的寶曆寺，「後為牛尚書預毀」；[116]又如咸通十一年（870），南詔圍攻成都城，時人范希越居住在東市附近，「蠻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117]

113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67，〈四川〉，頁 3139。

114 劉禹錫，〈新修福成寺記〉，《文類》，卷 36，頁 702。

11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52，「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條，頁 8173。

116 贊甯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7，〈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傳〉，頁 687。

117 范希越在廣明庚子年（880）之前居住於煑膠巷，「自言初居煑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淩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瓦中。蠻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其所言之事應發生在咸通十一年（870），南詔圍攻成都城期間。「煑膠巷」應該位於成都城東北郊，鄰近東市。宋代《成都古今記》載：「濯錦江自州西北，分派東流，至州北街過，入文富坊。東流至膠坊尾，又向南流於興聖觀，直東南至大慈寺，前有錦江橋。」膠坊位於宋羅城東北，即唐子城東北郊。唐宋成都坊巷具有重名的現象，如富春坊與富春巷。富春坊位於大慈寺旁，唐末杜光庭稱「富商龍家樓臨大慈寺後門、富春巷口」，富春巷應是富春坊中的街巷。以此推之，煑膠巷當為膠坊之街巷。富春坊位置參考孫華，〈唐末五代的成都城〉，收入《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282–283。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13，〈范希越天蓬印驗〉，頁 287；蘇軾撰，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3，〈和子由四首，韓太祝送游太山〉，頁 627；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8，〈龍家樓上孫處士畫天師驗〉，頁 22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中後期，成都城的新城區及其內部的市向地域廣闊的郊區擴展。郊城之市的發展，具有各自顯著的區位優勢。墊土、造橋、排水、[118]修路等基礎建設是郊城形成的重要過程，這離不開官府的規劃。成都城東郊、南郊、北郊的郊城中，形成了東市、新南市和寶曆寺蠶市、至真觀蠶市。諸郊市所在是官市、民居、寺廟、蠶市相間的混合郊城空間，兼具遊宴、消費、交通、宗教祈福等服務成都城官民的功能。這應符合當時城市發展所需，如韋皋在修建新南市混合郊城後，很快地「一日成市」，成為「一時之盛」。但缺乏城牆保護的郊城及其中的郊市，容易在戰爭期間遭受破壞。

三、唐後期（876年後）至宋初郊市向街市空間的轉變

到乾符三年（876），亦城亦郊的西市、南市及東郊的東市等區域，已經是「比屋連甍之勢，實類野居」，[119]「里閈錯雜，邑屋闐委，慢藏誨盜」。[120]要改變諸郊市區域的「野居」狀態，不僅需要羅城牆垣提供安全護衛，還需要網絡化的街道和水渠改善人居環境。當年，西川節度使高駢修建羅城，[121]將西市、南市和東市區域納入其中，並著力改善城內道路和水渠網絡。崔致遠（857–?）〈西川羅城圖記〉總結道：「天吳則燥水於寒泉，地媼則變沙為美土。」崔氏自注解釋「蜀地穿未盈尺，泉源漲起」，「蜀田無土，昔張儀築子城，輦土於學射山」，即指城址地下

118 成都城市考古發掘探明，唐代中後期成都郊城區域的排水渠是建設的重點。如內姜街古遺址位於唐成都城外東北郊，唐代早中期修建了網絡化的排水渠：主排水渠 G1，支渠 G2、G3，主路 L2 夯築於唐代晚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內姜街遺址發掘報告〉，頁 389。

119 王徽，〈創築羅城記〉，《文類》，卷 24，頁 496。

120 崔致遠撰，党銀平校注，《桂苑筆耕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2，〈謝立西川築城碑表〉，頁 40。

121 高駢修築羅城後成都城的形態與格局，參見孫華，〈唐末五代的成都城〉，頁 27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水淺和缺乏建築土壤。[122]秦代修城就開始到城北學射山取土，萬歲池亦是取土所形成。[123]修建羅城時，至城外取土，「負城丘陵悉墾平之」。[124]為排除地下水，唐中期開始，成都城出現了頗具規模的磚砌水渠。[125]網絡化的道路和水渠建設，當是高駢改造「野居」的郊城為「阡陌繩直，門閭棋布」形態的重要途徑。[126]羅城內的考古發掘表明，網絡化的夯築道路和磚砌水渠成型時間為唐末五代，[127]高駢修築羅城當是其重要契機和推動點。城市建設對市的分布產生了直接影響。

城市建設拆除了部分遠郊市的建築作為城內建材之用。如至真觀因城內建材獲取需求而被破壞，節度使吳行魯（870–871 在任）「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鐘樓，遺蹤勝賞，並為毀蕩矣」；節度使陳敬瑄（880–891 在任）僚屬王峰在城內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使力役者斸觀門土牆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128]依託至真觀空間的北郊蠶市

122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校注》，卷 16，〈西川羅城圖記〉，頁 542–543。

123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33，〈江水〉，頁 767。

124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224，〈高駢傳〉，頁 6393。

125 成都城磚砌水渠的疏治始於白敏中於大中六年（852）任節度使後，「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環街大渠」。席益，〈淘渠記〉，《文類》，卷 25，頁 512。

126 王徽，〈創築羅城記〉，《文類》，卷 24，頁 498。

127 如唐玄宗行宮位於成都子城東郊，玄宗回鑾不久，行宮御道就變為農地，「輦路已平栽藥地」。成都城市考古表明，唐晚期成都羅城之內的街道，夯築年代集中於唐晚期，與高駢修築羅城應有關係。如羅城東北部的內姜街唐宋遺址道路，其主路 L2 夯築于唐晚期，路基下為「黃色黏土層」，未見夯築；又如子城內的天府廣場東北側古遺址，探明唐晚期出現的泥土與瓦礫混雜夯築道路 L1；再如羅城東部的江南館街唐宋遺址，主路 L2 第一階段修建於唐末，修築方式為夯築土路。排水渠網絡亦進一步優化，如江南館街唐宋遺址探明了唐末形成的以 G2、G8、G9 為主排水道的水渠網絡。章孝標，〈題上皇觀〉，收入《全唐詩》，卷 506，頁 575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內姜街遺址發掘報告〉，頁 368、38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古遺址發掘報告》，頁 24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成都文物》2009 年第 3 期（成都），頁 4。

128 龍興觀即至真觀。王峰應是到學射山取土，波及至真觀。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2，〈益州龍興觀取土驗〉，頁 17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疑會遭受基礎設施毀壞的影響。

楊秀子城北郊原是相互連通的水池區域。[129]高駢修築羅城，北郊水池區域被納入羅城內，或經填埋和改造，所在區域具有了修建城區的條件，[130]該地隨即置市。乾符末，節度使崔安潛（?–898）在羅城北部置新北市，「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內，節度使崔安潛置新市，遷於大西門之北」。[131]新北市應是高駢修築羅城的延續，其名稱，應為與舊有的新南市相對應。

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完善的道路、水渠等設施，可以為貿易提供良好空間。如《北夢瑣言》記載了一則晚唐時期成都的典故「柳婢譏蓋巨源」，「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俾就宅」。[132]蓋巨源家在成都城北郊花林坊，外臨東西向大街，而有販賣綾羅者；又如楊秀子城東郊一帶，高駢修築羅城，在此設置羅城東門，門外開鑿了新的郫江主泓道作為護城河，河上修建與東門配套的橋樑。[133]宋初耿煥《野人閒話》專記五代蜀地事，載「元和子嘗因暇日，出蜀都東郭門。見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其船即似有物牽拽，飄然而逝，直抵大岸，應時粉碎，財貨悉皆溺于水」。[134]即「元和子」出羅城東門，

129 《水經注》載：「城北又有龍堤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通，冬夏不竭。」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72，〈益州〉，頁 1466；酈道元，《水經注校證》，卷 33，〈江水〉，頁 767。

130 唐代成都羅城北部的今江漢路古遺址，考古發現的城市遺跡最早年代是五代時期，應是羅城修築之後，城北區域才開始修建城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江漢路古遺址發掘簡報〉，收入氏編著，《成都考古發現（2014）》（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417–418。

131 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17，〈成都景雲觀三將軍堂柱礎驗〉，頁 336。

132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 4，〈柳婢譏蓋巨源〉，頁 86。

133 高駢開新的郫江主泓道為護城河之事，北宋呂大防（1027–1097）記曰：「沱舊循南湟，與江並流以東。唐高駢斥廣其穢，遂塞縻棗故瀆，始鑿新渠，繚出府城之北，然猶合于舊渚。」新的郫江主泓道，即今成都錦江府河段。呂大防，〈合江亭記〉，《文類》，卷 43，頁 835–836。

134 耿煥撰，陳尚君輯校，《野人閒話》，收入傅璇琮等主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10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600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見新辟之郫江主泓道邊有人以船隻轉運貨物。設施新、規模大的新城無疑為市場貿易提供了便利空間，蠶市及類似的定期市藉此得以向羅城內發展。[135]

五代前蜀時，蠶市已大規模出現在成都羅城內。《五國故事》載，前蜀先主王建（847–918，907–918 在位）時期，「蜀中每三月為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闐闐填委。建常登樓望之」。[136]王建妃花蕊夫人作〈宮詞〉，有「明朝駕幸遊蠶市，暗使氈車籠苑門」之句。[137]此時成都城內的宮觀等宗教場所依然是蠶市的重要空間依託，如「偽蜀將季，延秋門內嚴真觀前蠶市」。[138]街道上亦出現了蠶市，前蜀韋莊（836–910）稱「錦里蠶市，滿街珠翠」。[139]

前蜀之時，亦有成都城「街市」之記載。前蜀後主王衍（901–926，918–925 在位）「好擊鞠，常引二錦障以翼之，往往至於街市」。[140]街市繁華應在此時前後。關於街市貿易的場景，宋初勾延慶《錦里耆舊傳》載，前蜀乾德六年（924）四月，王衍「於大內造村坊，立市肆，令宮嬪著青布衫裙，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柴麵，一如民間。叫噪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妃后以為笑樂」。[141]王衍在皇宮之內模仿

135 唐晚期有成都城周邊農戶借用船隻向城區運送貨物，隨唐僖宗幸蜀至成都的蕭遘〈成都〉詩有「月曉已開花市合，江平偏見竹簰多」之句；五代前蜀韋莊有詩句「錦江風散霏霏雨，花市香飄漠漠塵」。「竹簰」指竹筏，成都城道橋眾多，無短途濟渡需求，竹筏也並非遊船，農戶應是用「竹簰」沿「錦江」運送貨物至城中花市交易。高駢開鑿之羅城郫江新道，對水運當有影響。蕭遘，〈成都〉，收入《全唐詩》，卷 600，頁 6935；韋莊，〈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收入《全唐詩》，卷 700，頁 8051。

136 佚名撰，張劍光、孫勵整理，《五國故事》，卷上，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3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頁 242。

137 浦江清，〈花蕊夫人宮詞考證〉，收入葉聖陶編，《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上海：開明書店，1947），頁 135。

138 黃休復，《茅亭客話》，卷 5，〈白蝦蟇〉，頁 39。

139 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 3，〈韋莊・怨王孫〉，頁 466。

140 佚名，《五國故事》，卷上，頁 243。

141 勾延慶撰，儲玲玲整理，《錦里耆舊傳》，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交易情形，或以當時成都城的街市為範本。可以蠡測，五代宋初成都城酒肆、食店等街市空間盛行，男女居民交易往來，一如〈清明上河圖〉所繪東京城之場景，而年代又早於後者。前蜀蠶市與街市之間應該存在某種聯繫，或許蠶市就是街市的部分內容。

此時羅城內的蠶市貿易並不穩定，如前蜀王建觀蠶市，「見其貨桑栽者不一，乃顧左右曰：『桑栽甚多，儻稅之，必獲厚利。』由是言出於外，民懼，盡伐其桑柘焉」。[142]統治者政策的變動導致民眾減少桑樹種植，對蠶市的貿易應有影響。諸市的空間亦有一定的限制，前蜀改楊秀子城為皇城，用作皇權禮儀空間。[143]前、後蜀時期在成都皇城內，應沒有市場可供交易。

宋初，成都城內的街市應包括藥市、蠶市等定期市和官市。如乾德二年（964）「蜀平……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144]《宋朝事實》又載，宋初益州城內「街市交易，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145]此處「街市」所指應是成都城內的主要貿易活動，當包含官市和蠶市等在內。成都城內街市應該已較為普遍，但其部分內容被官府所限制。如吳元載知成都府時（991–993），「蜀俗奢侈，好遊蕩，民無贏餘，悉市酒肉為聲技樂，元載禁止之」。[146]此句之意是吳元載禁止居民遊宴及其附屬的藥市、蠶市貿易。《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吳元載實代驤為成都……禁民遊宴行樂」。[147]大中祥符

第 1 編第 5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卷 6，頁 18。

142 佚名，《五國故事》，卷上，頁 242。

143 王建在稱帝建（前）蜀之前，即開始改造楊秀子城，《茅亭客話》載：「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904）封蜀王，霸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黃休復，《茅亭客話》，卷 2，〈崔尊師〉，頁 15。

144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點校本），卷 263，〈呂餘慶傳〉，頁 9099。

145 李攸，《宋朝事實》（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卷 15，〈財用〉，頁 232。

146 脫脫等撰，《宋史》，卷 257，〈吳元載傳〉，頁 8950。

147 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35，「太宗淳化五年正月」條，頁 76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年（1010），比部郎中蔡汶使西川還，「言川、峽每春州縣聚貨藥，謂之藥市，望令禁止之」，雖然宋廷並未應允，亦可見街市貿易所面臨的政策風險。[148]

唐後期（876 年後）至宋初，成都城經歷了亦城亦郊之市和郊市向街市空間的轉變。成都官府通過以羅城為主的建設，主導了「市」的進化。官府改建羅城，城市面積大為增加，設施更為有利。羅城宮觀、街道、城門的空間區位顯然比城外郊市更為優越，加之羅城本就囊括部分郊市，街市逐步取代郊市成為成都城貿易的主流空間，符合城市發展和官民的需要，但亦面臨政策風險。

四、北宋中期成都城街市的成熟與空間

北宋中期，成都城街市空間走向穩定。除了唐末城市建設提供的優良基礎設施外，還與宋廷的「特殊化」治蜀策略和經濟利益直接相關。[149]

（一）政治原因

官府調整治蜀策略，鼓勵遊宴及附屬蠶市、藥市貿易。宋廷認為，宋初成都多變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官將太過苛刻，如吳元載知成都府時（991–993），禁民遊宴，「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為盜，元載不能捕滅」。[150]宋廷撲滅李順起事後，調整統治策略，如宋太宗（936–997，976–997 在位）之言：「官吏得人，善於綏撫，使其樂業，雖無城可也。」[151]

14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3，「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辛巳」條，頁 1658。

149 諸多學者認為，北宋朝廷為應對長期割據的事實和數次變亂的時局，在四川採取特殊化的治理政策。余蔚和任海平持有的觀點比較具有代表性，他們認為「該區域特殊的自然環境和易於分裂的歷史傳承，使宋廷對它加意防範，從而引起政治態度和政治地理方面的特殊表現」。余蔚、任海平，〈北宋川峽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收入鄒逸麟、張修桂等編，《歷史地理》第 17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153。

15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太宗淳化五年正月」條，頁 766。

151 李攸，《宋朝事實》，卷 17，〈削平僭偽〉，頁 27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廷較為縱容、鼓勵成都城的遊宴之風，「西蜀繁富，風俗華侈，摸石、[152]藥市等會，士女駢集，競為奢僭，帥守、監司往往勉徇其俗，謂不如是，必召亂」。[153]宋廷調整統治策略的具體執行人是張詠，他在第二次知益州期間（1003–1006），見「蜀風尚侈，好遨樂」，「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154]以此形成定制，「益州每年舊例，知州已下五次出遊江，並山寺排當，從民遨樂」。[155]據魏華仙研究，北宋中期及稍後，知益州張詠、趙稹（963–1038）、薛奎（967–1034）、文彥博（1006–1097）、田況、宋祁（998–1061）和知成都府趙抃（1008–1084）前後相繼，維持了遊宴及附屬蠶市、藥市等街市貿易的長期興盛。[156]

（二）經濟原因

首先，北宋中期，成都府將寬闊的城市主幹道提供給商人從事貿易活動，為街市提供空間，商人則向官府提供一定的稅收。「成都府門之外，有通衢二焉，一直門之東西，一直門之南北。衢因孟氏僭踰之跡，廣背九軌。治平（1064–1067）間，部刺史有因民所利者，俾之廬之，以為列肆，而斂其欵布，輸之學官，歲不減七八百緡。」[157]其次，街市貿易有利於官榷商品的出售，因此得到官府的進一步支持。遊宴帶來的人流與街市貿易呈正相關，蜀民「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

152 北宋吳中復（1011–1079）〈游海雲寺唱和詩〉稱「成都風俗：歲以三月二十一日遊城東海雲寺，摸石於池中，以為求子之祥」。吳中復，〈游海雲寺唱和詩〉，《文類》，卷 9，頁 187。

153 李樸，〈豐清敏公遺事〉，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135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 52。

154 韓琦，〈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40 冊，頁 126。

155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刑法二〉，頁 8297。

156 魏華仙，〈宋代成都官府力量與節日市場〉，頁 160–165。

157 彭汝礪，〈元祐府學給田記〉，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129 冊，頁 26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尤盛焉，動至連月」。[158]「遨遊之費」使得官營商業獲利頗豐，「曩時宴會皆牙校掌之，蓋榷酤之利有餘，人樂於為役。公帑歲入，亡慮千萬貫有奇」。[159]天禧三年（1019）之後，成都府治西園開放給市民遨遊，「近歲自二月即開園，踰月而後罷。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160]再次，街市貿易有助於促進農業生產。春季蠶市之時，「所以農桑具，市易時相望。野氓集廣鄽，眾賈趨寶坊」，農民進城可購買農具以供耕種之用，地方官員亦藉此教化農民「惇本誡急務，戒其靡愆常」。[161]秋季藥市之時，地方官員「但喜山民藥貨售，歸助農業增耡芟」，[162]農民進城售賣藥材，[163]亦是增加收入、反哺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在官府鼓勵的背景下，成都定期市、官市空間逐漸街市化，在形態方面趨於相似，均與街道關係密切，這可以視為街市成熟的標誌。從空間形態上看，宋代成都城的街市主要分為流動的定期市——「十二月市」和固定的街邊商鋪兩種形式。

（一）流動的定期市——「十二月市」

經過宋初的發展，原春秋兩季的蠶市、藥市貿易擴展為常年的「十二月市」。據北宋趙抃《成都古今記》載，成都城每月集期貿易的名稱為：「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

158 脫脫等撰，《宋史》，卷 89，〈地理志〉，頁 2230。

159 佚名撰，謝元魯校釋，《歲華紀麗譜》，收入《巴蜀叢書》第 1 輯（成都：巴蜀書社，1988），頁 107。

160 佚名，《歲華紀麗譜》，頁 138。

161 田況，〈（二月）八日大慈寺前蠶市〉，《文類》，卷 9，頁 179–180。

162 田況，〈重陽日州南門藥市〉，《文類》，卷 9，頁 183。

163 宋代，四川是重要的藥材專業化生產地，藥材生產是「農村副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故宋代藥市普遍興起」。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頁 5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月桃符市」，合稱「十二月市」。[164]每一月市相當於主題百貨街市，諸多行商和城郊農戶進城貿易，佔據街道兩側和廟宇、官府後苑等擁有較大空地的場所進行交易。子城南門至銅壺閣的南北軸線道路及附近地域為藥市繁盛帶，南宋京鐘（1138–1200）稱「玉局祠前，銅壺閣畔，錦城藥市爭奇」。[165]玉局祠與子城正南門相鄰，[166]銅壺閣位於子城的幾何中心，[167]京鐘此意，指從子城南門到中心銅壺閣一帶，包括連接兩者的南北主幹道及附近區域在內，大都被藥市所佔據。玉局化是其最為繁華之處，「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閱」。[168]羅城東西向軸線道路錦江橋、小東門至大慈寺南門段是另一街市繁盛區。[169]宋初，錦江橋一帶便

164 陶宗儀，《說郛》，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62 下，引《成都古今記》，頁 382。

165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1847。

166 許凱翔，〈宋代成都玉局觀藥市的宗教性〉，頁 89–90。

167 北宋吳拭稱「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曆四年（1044），知府事蔣公堂作漏合，以直午門。」政和元年（1111），吳拭改建漏合為銅壺閣，銅壺閣與子城正南門相直。北宋彭汝礪稱：「成都府門之外，有通衢二焉，一直門之東西，一直門之南北。」成都府治附近有東西向與南北向兩條軸線道路，它們的交會點位於成都府東側 50 步，即吳拭所稱「府門稍東垂五十步」，即銅壺閣所在。陸游詳敘：「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逵，達于侯牧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劍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道北為府……至蔣公堂來為牧，乃南直劍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銅壺閣是成都府治附近直成都城南北之門和東西之門兩條城市中軸線的交會點，亦是子城的幾何中心。吳拭，〈銅壺閣記〉，《文類》，卷 26，頁 523；彭汝礪，〈元祐府學給田記〉，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129 冊，頁 268；陸游，〈銅壺閣記〉，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34 冊，頁 96。

168 莊綽撰，夏廣興整理，《雞肋編》，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4 編第 7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卷上，頁 25。

169 按照孫華復原的唐末成都羅城圖，羅城小東門位於今大慈寺東南側約 390 公尺。唐宋大慈寺即位於今大慈寺所在地，規模遠超現今，宋代大慈寺南門距離羅城小東門應當更近。大慈寺門附近即是錦江橋（見註 117），可以推測，錦江橋亦是羅城小東門外郫江之橋。大慈寺市場貿易的繁榮，與錦江橋和小東門及其道路關係密切。孫華，〈唐末五代的成都城〉，頁 278；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成都城坊古蹟考》，頁 373–37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常見藥品貿易，如「開寶初，錦江橋側有周處士者，鬻十香丸……人常聚覩歎賞之」；又「淳化中，（黎海陽）在益州錦江橋下貨丹，筋骨輕健」。[170]北宋中期，成都府官員登上大慈寺門樓所觀「錦江夜市」，應是指錦江橋、小東門、大慈寺一帶依託城門、道路、橋樑的街市。[171]其餘道路亦被用作街市場所，如羅城東部的觀街，唐末已經成型為街區，[172]宋代發展為著名的「觀街藥市」。[173]《錦繡萬花谷》又載成都「鬻香藥於官街，號藥市」；[174]宋末元初汪元量（1241–?）亦稱「蜀鄉人是大醫王，一道長街盡藥香」。[175]

十二月市作為定期市，四方民眾臨時進城貿易貨物，其交易設施多搭建於街旁，與如今街邊的商品攤位類似。如重九時節，川蜀山民攜帶各色藥材，佔據成都府城（子城）南門附近的建築屋簷、回廊下為臨時攤位，「山民采捋知辛甘。成都府門重陽市，遠近湊集爭齎簷」。[176]南宋度正（1166–1235）曾遊覽南門藥市，「細閱廊宇下，紛然莫窮詰。席地堆雄附，連盤佇參術」。[177]廊宇下的貨物或直接堆在地上，或以盤乘；又如城中另一街市繁盛之大慈寺及附近，北宋人曰：「成都大聖慈寺，據闤闠之腹，商列賈次、茶爐藥榜、逢占筵專、倡優雜戲之類，坌然其

170 黃休復，《茅亭客話》，卷 5，〈黎海陽〉，頁 38；卷 9，〈試金石〉，頁 68。

171 佚名，《歲華紀麗譜》，頁 147。

172 「觀街」當為街道名稱，其位置在大慈寺後門。唐末杜光庭稱：「成都觀街東壁，富商龍家樓臨大慈寺後門、富春巷口。」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 8，〈龍家樓上孫處士畫天師驗〉，頁 228。

173 佚名，《歲華紀麗譜》，頁 129。

174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收入《四庫類書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續集卷 11，〈成都府路〉，頁 878。

175 汪元量撰，孔凡禮輯校，《增訂湖山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4，〈藥市〉，頁 138。

176 田況，〈重陽日州南門藥市〉，《文類》，卷 9，頁 182–183。

177 度正，《性善堂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步自玉局會飲于判院塗丈廨舍正得日字〉，頁 159。

臺大考古學期刊資料庫

中。以遊觀之多，而知一方之樂也。」[178]宋代名儒程頤（1033–1107）「在成都，一日遊大慈寺，廊下有治篾者」。[179]「治篾者」或是廊下出賣勞力、手工服務之工匠。據《鐵圍山叢談》載，宋時：

> 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閒〔間〕號名藥市者，於是有於窗隙閒〔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窗隙閒〔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夫跡既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180]

以「重陽時開」寺，結合「遊觀」可知，大慈寺的貿易是與遊宴相結合的定期市。商賈、茶藥、占卜、技藝表演等，均應是在特定日期於寺內擺攤設點，吸引了城郊民眾前來貿易、遊觀。呼「貨藥」者的攤位應是臨時搭建，或為走街販賣，位置並不固定，因而「跡既叵測」。

定期市的空間還可通過時人的場景比附來觀察。宋代成都城某些特別繁華的場景就被比附為「蠶市」，如北宋葛琳〈和浣花亭〉描繪四月十九日浣花遊江場景，稱「夾岸布緹帟，中流喧鼓吹。泝沿煙靄間，禽魚共翔戲。都人與士女，疊足連帷被」，葛琳評價這種遊江場景「羣嬉逐使轂，雜處同蠶市」。[181]此處「同蠶市」之意，為浣花遊江沿途人群熙熙攘攘、遊宴消費、官民同樂之景觀，與蠶市大概類似。官府本就在浣花遊江途中設置了蠶市空間，[182]葛琳可以直觀比較遊江途中蠶市和其他地域的景觀，所論應該較為真實。又成都府衙後西園，在春季開放給士庶縱觀，「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於蠶市」，遊宴消費之景，繁華過於蠶市。[183]蠶市展示的人來人往、消費娛樂景觀，應是北宋中期

178 侯溥，〈壽寧院記〉，《文類》，卷 38，頁 742。

179 度正，《性善堂稿》，卷 10，〈送徐生游成都序〉，頁 226。

180 蔡絛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6，頁 104–105。

181 葛琳，〈和浣花亭〉，《文類》，卷 7，頁 124。

182 如知益州張詠在城南萬里橋邊的寶曆寺前設置了蠶市，「寺前創一蠶市，縱民交易」。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成都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3117。

183 佚名，《歲華紀麗譜》，頁 138。

臺大博物館刊資料庫

之後成都城街市的常態。

（二）固定的臨街店鋪

相對於流動性較強的定期集市，臨街店鋪對城市的排水和街道等基礎設施要求更高。唐晚期，夯築的街道和磚砌的水渠將羅城內的城區圍合成一個個方格狀區域。[184]地勢較高的成都城西、北從唐代前期就發展為人口密集的區域；[185]地勢較低的城東、南則遺留有較多的空白地帶，為街市店鋪的擴展提供了空間。成都城市考古在唐末、宋代成都城的東部、南部發現了較多臨街店鋪遺跡。臨街店鋪於唐末在夯築優良的街邊零星出現，並在宋代逐漸擴展。[186]部分區域臨街店鋪遺跡十分密集，如唐宋江南館街遺址，探明了唐末、兩宋 25 間（套）沿街開門的臨街店鋪房址。店鋪外，唐末修建的夯土主路寬約 6–7 公尺，輔路寬約 3.5 公尺；延續使用至南宋時，主路變窄至 2.2 公尺、輔路窄至 2 公尺。[187]侵街現象當與街市的興盛和店鋪修建有關。成都城內甚至形成了居住與街市分開的房屋形式，即在車馬所集的主幹道旁修建街鋪，在稍遠的環境清幽之地修建住宅。[188]唐代官市區域，到宋代亦是街市形態。寶元二年（1039），「益州言火焚民廬舍三千餘區。時火起南市，知州……不救火，故所焚甚眾」，[189]從唐代繼承的南市空間，此時已是居住和街道相結合的街市地域。淳熙丁未（1187）夏五月，「成都大火，所燔七千家。府有棋盤市……居民櫛比，一燎無遺」，官府稍後重修南市區域，「自

184 其形態可參見「江南館街遺址發掘區平面圖」。易立，〈唐宋時期成都城里坊格局與形態的考古學觀察〉，頁 269。

185 隋唐時期，成都「城西城北，人稠施多」。道宣，《續高僧傳》，卷 27，〈隋益州沙門釋富上傳〉，頁 1052。

18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內姜街遺址發掘報告〉，頁 364–390。

187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頁 2–4。

188 蹇汝明，〈鈍庵記〉，《文類》，卷 44，頁 856–857。

189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23，「仁宗寶元二年六月丁丑」條，頁 291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錦江而北，繩引棋布，巷陌一新，洞達疏明」。[190]官府在重建南市時，重點修建了「巷陌」等街道，街邊民居、店鋪或是由居民自行建造。

北宋中期，官府基於政治和經濟因素鼓勵發展街市，是街市穩定進而成熟的重要原因。臨街店鋪和定期市共同構成了宋代成都城的街市空間，城市主幹道路和與之相通的城門、橋樑區域則是街市最為繁榮的地帶，[191]比如子城五門、羅城小東門、銅壺閣一帶等。宋代仍有蠶市存在於羅城門外側，如大西門睿聖夫人廟蠶市、南門寶曆寺蠶市，但其核心區位優勢是位於城門處，可被看作是街市貿易的延伸。[192]街道空間成為街市繁榮的重要保證，如知成都府范成大（1126–1193）在磚砌成都街道後，數次自譽其有利於街市的繁華，「石笋新街好行樂，與民同處且逢場」，「新街如拭過鳴騶……十里珠簾都卷上，少城風物似揚州」。[193]以十二月市為代表的街市，是宋代成都城經濟繁榮的象徵，「貿易無繁于藥市」；[194]街市亦是宋代成都城景觀的重要內容，陸游曾在成都城中軸線街道交匯的銅壺閣宴飲，後回憶其眼見的街市景象為「最憶銅壺門外路，滿街歌吹月如霜」。[195]

---

190 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乙集卷 8，〈丁未成都火〉，頁 640。

191 宋代成都城的城門附近是街市的繁華地帶，還可從文彥博糶賣糧食的空間安排窺見。「文潞公任成都府日（1044–1047），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文彥博在城門附近的寺院設置了 18 處糧食糶賣點，張榜通衢，告知居民相關政策。范鎮撰，汝沛、永成整理，《東齋記事》，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卷 4，頁 221。

192 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原在小市橋，田況移置；南門寶曆寺蠶市由張詠創設，位於羅城南門外萬里橋附近（見註 182）。佚名，《歲華紀麗譜》，頁 136。

193 范成大，〈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三月二日北門馬上〉，《文類》，卷 9，頁 194、195。

194 王質，〈西征叢紀序〉，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58 冊，頁 283。

195 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劍南詩稿校注》第 3 冊，卷 13，〈湖村月夕・又〉，頁 274。

臺大學術資料庫

結　語：城「市」空間的連續性演化脈絡及特徵

唐宋成都城「市」的空間演進，受到人文和自然等多重時空因素的影響。人文因素方面，隋唐坊市制和宋代治蜀策略的推行、戰爭、城市建設等直接決定了市的空間布局；自然因素方面，成都獨特的自然環境，如兩江雙流、地下水、地勢、土壤等對市的空間形態、分布亦有顯著影響。多重時空因素的交織，使得成都城「市」的空間形成「活的」即連貫的演進脈絡，其理路具體而清晰，從「成都市」—「亦城亦郊的官市」—「郊市」—「街市」梯次延續。唐代早期的官市直接繼承於漢晉時期城外「成都市」的區位，官府修整了亦城亦郊的西市、南市。唐中晚期（876年前），因應城市擴展的需要，成都主政官員在城外郊城中修建了東市、新南市和寶曆寺蠶市；城北郊的萬歲池、學射山一帶具有服務城市官民遊宴、宗教、交通的區位功能，令至真觀蠶市得以萌芽發展。唐末（876年後）五代至宋初，官府修建羅城、整齊羅城之內的道路、水渠。羅城內人居環境改善，為貿易活動提供了較具區位優勢的寬廣空間。此時期新北市建立，且街市走向興盛，成為城市貿易的主要內容，但亦遭遇政策風險。北宋中期，宋廷基於政治和經濟利益，調整統治策略，鼓勵街市貿易，依託城市道路（包括附屬之城門、橋樑）及附近廟宇、衙署後苑空間的街市走向穩定、成熟。整體而言，唐宋成都城「市」的空間演進脈絡具有三個特徵：

（一）官府主導的進程。官府對市的空間布置，最顯著的影響就是置市和城市建設。唐官府直接設置了諸多官市和郊市，宋官府還設置了諸多蠶市。官市、郊市、街市的空間，大多以官府的城池建設為契機，呈現跨越式發展。隋楊秀改造子城、唐高駢營造羅城，無疑對市的空間產生了深遠影響。官府主導的城市宴遊，對蠶市、街市的繁榮亦具重要促進作用。官府的政策變動，對市亦產生不利或者有利的影響。

（二）綜合考量的區位。何地能夠置市、市繁榮於何處，是時人綜合考量人文、自然等因素的結果。在配合城市擴展和服務城市官民的功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能定位下，市的區位構成中，道路、發展基礎、遊宴消費等人文因素，和距離遠近、環境等自然因素都具重要影響。官市、郊市、街市的空間位置在各自時代大致具有一定的優越性，而時代變化下的區位改變，應是諸市空間演進的具體原因。

（三）混合的空間。諸市所在區域多為混合式的城區，「成都市」中有祠廟、學校、住宅、軍營，唐代官市、民居、寺廟、蠶市則一同構成城區擴展的混合郊城。官市內部亦有民居、軍營、寺廟分布，蠶市則多依靠寺觀空間而設。街市以街道為主要空間，與街邊的民居、店鋪、寺觀、衙署後苑等混合為一體。

在「城市市場形態從唐代的封閉性坊市制轉變為宋代的開放性街市制」之認識下，既往研究突出了「宋代城市市場之『開放』印象」，「襯托下了唐代政府對城市市場的管理與控制」的特點。[196]筆者認為，唐宋成都城「市」的空間演化理路清晰且具有連續性。將唐宋成都「市」置於成都城整體中觀察，可以發現市是作為城區擴張和發展的重要功能區而存在的。在唐宋成都府的主導下，集合人文和自然等綜合區位因素，市的空間演變與城區擴展和官民城市生活的需要保持了一致。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吳昌峻　廖芷青）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96 包偉民，〈唐代市制再議〉，頁 179–180。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王 溥撰，《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60。

王象之撰，趙一生點校，《輿地紀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王應麟撰，傅林祥點校，《通鑑地理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收入《四庫類書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勾延慶撰，儲玲玲整理，《錦里耆舊傳》，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5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四川大學博物館、成都市博物館，〈成都指揮街周代遺址發掘報告〉，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1 輯，頁 171–209。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

任 廣，《書敘指南》，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2980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墨海金壺叢書本排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廣場東御街漢代石碑發掘簡報〉，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8 輯，頁 1–8。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江漢路古遺址發掘簡報〉，收入氏編著，《成都考古發現（2014）》，頁 389–419。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東華門古遺址 2013–2014 年度發掘收穫〉，《成都文物》2015 年第 1 期，成都，頁 7–1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古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 2020 年田野考古工作紀要〉，《成都文物》2021 年第 1 期，成都，頁 70–8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內姜街遺址發掘報告〉，收入氏編著，《成都考古發現（2004）》，頁 364–391。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成都文物》2009 年第 3 期，成都，頁 1–5。

成都市文物考古隊、四川大學歷史系，〈成都市上汪家拐街遺址發掘報告〉，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5 輯，頁 325–408。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成都市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成都指揮街唐宋遺址發掘報告〉，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2 輯，頁 233–298。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方池街古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 年第 2 期，北京，頁 297–316。
何光遠撰，鄧星亮等校注，《鑒誡錄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1。
佚　名撰，張劍光、孫勵整理，《五國故事》，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3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佚　名撰，謝元魯校釋，《歲華紀麗譜》，收入《巴蜀叢書》第 1 輯。成都：巴蜀書社，1988。
岑　參撰，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志　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李　攸，《宋朝事實》。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李　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點校本。
李　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李　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杜光庭，《神仙感遇傳》，收入氏撰，羅爭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
杜光庭，《道教靈驗記》，收入氏撰，羅爭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
汪元量撰，孔凡禮輯校，《增訂湖山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
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5。
度　正，《性善堂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
范　鎮撰，汝沛、永成整理，《東齋記事》，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
孫光憲撰，貫二強校點，《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
班　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點校本。
祝　穆撰，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
耿　煥撰，陳尚君輯校，《野人閒話》，收入傅璇琮等主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10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袁說友等編，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北京：中華書局，2011。
　　王　徽，〈創築羅城記〉，卷 24，頁 496–499。
　　田　況，〈（二月）八日大慈寺前蠶市〉，卷 9，頁 179–18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田 況，〈重陽日州南門藥市〉，卷 9，頁 182–183。
田 況，〈浣花亭記〉，卷 43，頁 837。
吳 拭，〈銅壺閣記〉，卷 26，頁 523。
吳中復，〈游海雲寺唱和詩〉，卷 9，頁 187。
呂大防，〈合江亭記〉，卷 43，頁 835–836。
李大臨，〈聖興寺護淨門屋記〉，卷 38，頁 739。
杜 甫，〈春水生二絕・又〉，卷 3，頁 50。
辛棄源，〈至真觀記〉，卷 36，頁 691–692。
侯 溥，〈壽寧院記〉，卷 38，頁 741–742。
段文昌，〈菩提寺置立記〉，卷 36，頁 698。
范成大，〈三月二日北門馬上〉，卷 9，頁 194。
范成大，〈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卷 9，頁 195。
韋 皋，〈寶曆寺記〉，卷 36，頁 697。
席 益，〈淘渠記〉，卷 25，頁 512。
高 駢，〈請築羅城表・又表〉，卷 18，頁 381。
張 詠，〈益州重修公宇記〉，卷 26，頁 520。
揚 雄，〈蜀都賦〉，卷 1，頁 2。
葛 琳，〈和浣花亭〉，卷 7，頁 124。
劉禹錫，〈新修福成寺記〉，卷 36，頁 702。
寔汝明，〈鈍庵記〉，卷 44，頁 856–857。

馬 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北京：中華書局，2004。
崔 璩，〈魏師魯墓誌銘〉。成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崔致遠撰，党銀平校注，《桂苑筆耕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常 璩著，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
張 籍撰，徐禮節等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張唐英撰，冉旭點校，《蜀檮杌》，收入傅璇琮等主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10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曹學佺撰，劉知漸點校，《蜀中名勝記》。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
脫 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點校本。
莊 綽撰，夏廣興整理，《雞肋編》，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4 編第 7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郭知達編，陳廣忠點校，《九家集注杜詩》。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20。
陳元靚撰，許逸民點校，《歲時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
陶宗儀，《說郛》，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陸 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劍南詩稿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據揚州詩局本斷句排印。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馮　任等纂，天啟《新修成都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 1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 據 1962 年熊承顯抄本影印。
黃休復撰，趙維國整理，《茅亭客話》，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1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董　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據嘉慶本影印。
道　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
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劉　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
劉　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劉　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齋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樂　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樓　鑰，《攻媿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2003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
蔡　絛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
盧照鄰著，李雲逸校注，《盧照鄰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
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點校本。
薛季宣，〈敘握奇經〉，收入曾棗莊編，《宋代序跋全編》，卷 37，頁 1004。濟南：齊魯書社，2015。
贊　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蘇　軾撰，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二、近人研究

包偉民，〈唐代市制再議〉，《中國社會科學》2011 年第 4 期，北京，頁 179–189。
包偉民，〈唐宋城市研究學術史批判〉，《人文雜誌》2013 年第 1 期，西安，頁 78–96。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成都城坊古蹟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成　璐，〈成都地鐵 1、2 號線工程主要水文地質問題分析〉。成都：成都理工大學環境地質專業碩士論文，2008。
成一農，〈「中世紀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2 期，北京，頁 77–87。
余　蔚、任海平，〈北宋川峽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收入鄒逸麟、張修桂等編，《歷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史地理》第 17 輯，頁 153–16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
李孝聰，〈唐代城市的形態與地域結構——以坊市制的演變為線索〉，收入氏著，《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頁 61–11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易　立，〈唐宋時期成都城里坊格局與形態的考古學觀察〉，收入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22 輯，頁 253–281。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
俞偉超、李家浩，〈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漆器製地諸問題——從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歷史變化〉，《考古》1975 年第 6 期，北京，頁 344–348。
流沙河，〈唐玄宗成都行宮推測〉，《文史雜誌》2011 年第 4 期，成都，頁 4–5。
唐坤全，〈從紅星路下穿隧道施工淺談成都地區地下工程施工技術〉，《工程科技》2004 年第 2 期，成都，頁 46–50。
孫　華，〈唐末五代的成都城〉，收入《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頁 255–290。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浦江清，〈花蕊夫人宮詞考證〉，收入葉聖陶編，《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頁 91–144。上海：開明書店，1947。
宿　白，〈隋唐城址類型初探（提綱）〉，收入北京大學考古系編，《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週年論文集》，頁 279–2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紹　風、石湍，〈「金河」為「郫江」故道說（上）〉，《成都文物》1983 年第 1 期，成都，頁 37–40。
許凱翔，〈八十年來唐宋史議題中關於特定商品集市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 27 期，2013 年 12 月，臺中，頁 107–136。
許凱翔，〈宋代成都玉局觀藥市的宗教性〉，《臺大歷史學報》第 64 期，2019 年 12 月，臺北，頁 85–123。
許凱翔，〈唐宋蜀地廟市的宗教空間：以三月三日蠶市為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70 期，2020 年 1 月，香港，頁 29–59。
陳　濤，〈唐宋城市史研究再思考〉，收入楊共樂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1 年上卷，頁 269–27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寧　欣、陳濤，〈「中世紀城市革命」論說的提出和意義——基於「唐宋變革論」的考察〉，《史學理論研究》2010 年第 1 期，北京，頁 125–134。
寧　欣、陳濤，〈唐宋城市社會變革研究的緣起與思考〉，《中國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北京，頁 25–30。
劉　寧，〈唐宋軍伶考述〉。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蔣　成，〈論成都唐宋羅城 1、2 號門址〉，收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成都考古研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2009）》，頁 536–541。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浙江學刊》2003 年第 3 期，杭州，頁 99–103。
鞠清遠，〈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食貨》第 3 卷第 6 期，1936 年 2 月，上海、北平，頁 28–34。
魏華仙，〈宋代成都官府力量與節日市場〉，《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成都，頁 159–168。
羅開玉，〈秦在巴蜀的經濟管理制度試析——說青川秦牘、「成亭」漆器印文和蜀戈銘文〉，《四川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 年第 4 期，成都，頁 78–83。
羅開玉、謝輝，《成都通史・秦漢三國（蜀漢）時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加藤繁著，吳傑譯，《中國經濟史考證》第 1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收入氏著，吳傑譯，《中國經濟史考證》第 1 卷，頁 239–277。
加藤繁，〈唐宋時代的市〉，收入氏著，吳傑譯，《中國經濟史考證》第 1 卷，頁 278–303。
加藤繁，〈唐宋時代的草市及其發展〉，收入氏著，吳傑譯，《中國經濟史考證》第 1 卷，頁 310–336。
妹尾達彥，〈城市的生活與文化〉，收入谷川道雄主編，李憑等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的基本問題》，頁 317–385。北京：中華書局，2010。
施堅雅，〈導言：中華帝國的城市發展〉，收入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頁 3–36。北京：中華書局，2000。

三、網路資源

華西都市網，〈成都寬窄巷子旁挖出千年名剎「福感寺」〉，原載《華西都市報》，2017 年 6 月 5 日。http://news.huaxi100.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8&id=891183.
央廣網，〈三藏法師在此受戒　神秘古剎福感寺就在成都實業街〉，原載《華西都市報》，2017 年 6 月 29 日。http://sc.cnr.cn/sc/2014jiaodiantu/20170629/t20170629_523824393_2.shtml.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3 (Jun. 2024), pp. 1–4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406_(73).0001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Chengdu Cities' Marketplac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u, Lei*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Marketplace space in the Chengdu are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as clear and eviden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hengdu Market place 成都市" outside the city, West Marketplace 西市 and South Marketplace 南市 appeared outside Zicheng, a suburban area.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before 876 BCE), establishing Marketplace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burbanization, for example, East Marketplace 東市, Xinnan Marketplace 新南市, Baoli Temple Silkworm Marketplace 寶曆寺蠶市, and Zhizhen Taoist Temple Silkworm Marketplace 至真觀蠶市.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after 876 BCE) and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Luocheng 羅城 city, "street Marketplaces 街市" soon became common in the Luocheng area. In the middl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treet Marketplaces became mature and stable. The spatial path of the marketplace in Chengdu City was consistent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engdu City Government, by considering both human and natural location factors, the marketplaces met the needs of urban expansion and life of the urban residents.

Key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engdu, Marketplace, Space, Locatio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engdu University. No. 2025 Chengluo Avenue, Chengdu 610106, China; E-mail: wul@pku.edu.cn